

邓小平新发展观论纲

陈祖华

本文在综合考察和评述国外关于发展理论多学科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邓小平新发展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条件、基本内容及主要特点等问题,作了比较系统、概括性的论述。全文分为三大部分:首先,综合性地考察和评述国外发展理论研究的现状和特点;其次,对邓小平新发展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条件和基本内容,作了系统而具体的阐述;再次,对邓小平新发展观的主要特点,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和说明。文中贯穿着对邓小平新发展观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阐述。

发展问题,是世界现代化、当代世界与中国所面临的一个突出的现实问题,也是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关注的一个理论“热点”。在国内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以其深邃的历史眼光与巨大的理论勇气,阐述了一种新的发展观念,论述了当代中国以至世界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丰富了人类发展理论的思想宝库,值得认真研究。限于篇幅,本文将在综合考察国外多学科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邓小平新发展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条件、基本内容与主要特点等问题,作初步的纲要式的论述,以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与进一步探讨。

要阐述邓小平的新发展观,并理解其新之所在,必须对发展理论已经取得的成果进行考察。

发展理论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理论,是从50年代开始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它以现代化与发展为研究对象,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探讨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发展问题,形成了众多的理论观点与学派,诸如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社会发展的内因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发展主义,内源发展理论,全球发展理论,新比较政治经济学,等等。

尽管上述理论观点与学派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存在差异以至对立,但大都以确认现代化及其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为前提,对现代化的动因、条件、类型、目标、道路与对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有的学派还从全球资源、人口、能源、环境、科技发展、国际关系等方面进行了

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战略。从总体上说,上述理论观点与学派各有长短,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具有不同范围、不同程度的真理性或合理因素,对于解决我国当代的发展问题具有不同程度的参考与借鉴意义。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绝大多数发展理论都是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框架中论述发展的。它们以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现实为依据,划分现代与传统,宣扬“西方中心主义”,认为西方国家的现在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未来,没有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发展作出有价值的论述。一些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与发展的理论,除极少数考虑到社会主义选择的可能外,绝大多数也都是在以资本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前提下论述发展的,没有也不可能对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问题进行完整的研究。

那末,马克思主义有没有自己的发展理论?有没有对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问题作出相对完整的论述?对于前一个问题,国外许多发展理论的学者都表示沉默。然而我们却可以明确地指出,从哲学的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不仅有自己的发展理论,而且有与当代科学精神相一致的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整的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发展学说,它深刻地揭示了基于自己运动和自生生命而产生的量的积累,质的变化,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运动过程。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思想,理应成为当今“发展哲学”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从社会历史理论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历史学说,无疑是把社会历史发展作为关注的重点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内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在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基础上指出社会形态的历史更替的。不仅如此,马克思还依据东方社会的特殊情况,指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为人们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特殊发展道路。与此相联系,前苏联和东欧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也大都对如何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过探索,并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取得了不同的进展。所以,西方一些学者无视甚至否认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发展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但无可讳言的是,以往关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问题的探索,总体上并不成功,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上发生的急剧变化,更是引人深思。因此,对于前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正确的回答是还需要很好的探索。

二

邓小平的新发展观,正是这一探索的初步成果。它是在国内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情况下,适应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发展的需要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从国内来说,实现现代化是19世纪中期以来我国历代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新中国建立以后日益成为党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1957年以后,这种实践活动便日渐为阶级斗争所冲淡和取代。在国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基本上处于一种自给半自给的封闭状态。邓小平的新发展观,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过渡、从经济上基本处于封闭状态向多层次全方位开放转变的历史条件下,在观念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相互推动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从国际上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对国际形势总的估计明显带有“左”的倾向,对世界大战的危险估计过于严重,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并提出了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著名论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冷静地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后来发生了苏东事件,进而出现了世界格局由两极向多极化发展的局面。邓小平的新发展观,也是在国际形势发生急剧的、重大的、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

适应于这一重大变化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综上所述，邓小平的新发展观，是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中，回答与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理论成果。关于这一理论成果的基本内容，邓小平的论述很多，内容也很丰富，这里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概括与阐发。

1. 确认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众所周知，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许多国家都把“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等论断当成了教条，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而把发展生产力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极大地妨碍了生产力与经济建设的发展。这就不禁使人要问：为什么在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内，会出现这样一类普遍性问题？应该怎样认识与解决？要深入回答这一问题，看来只有从世界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去探求。世界现代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深深地植根于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而形成的一股巨大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它发端于17世纪，起步于西欧，逐步席卷了整个世界。由于各国国情不同，经济、政治与文化条件的差异，世界现代化进程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一些国家沿着所谓“先发型”、“自生型”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发展起来了，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了“中心”地位，而多数国家则在所谓“后发型”、“回应型”的道路上艰难地行进，处于“边陲”、“外围”、不发达的地位。社会主义现代化，则是世界现代化不平衡发展的产物，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积聚与集中的产物，是世界经济体系财富与贫困两极化的产物，因此，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产生于一些生产力与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并不是偶然的、不可理解的历史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国内与国际的双重压力，面对着一批工业化国家和一大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这样双重的国际环境，出现较为普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与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错误，也同样是理解的一种历史现象。这是一种超越真理适用的时空范围的错误，也是一种由主观与客观、自身与对方、国内与国际、自觉与不自觉等多重因素交叉作用而形成的历史迷误。我们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为这种错误辩解的企图，但坚持唯物史观，就不能不对这一较为普遍的历史现象作出符合于历史实际的分析。而恰恰是这种历史迷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得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阶级、政党与领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意识到这其中包含的并占有相当大份额的主观的、自身的失误。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不仅走出了这种历史的迷误（在某种意义上也“得益”于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把错误推向了极端），从现实中深刻地感受到我国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生产力发展的严重失误，而且在总结国内国际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社会主义的本质与根本任务的高度，论述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这就从根本上回答并解决了历史与现实向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发展生产力与经济的问题。邓小平的这一论述，是唯物史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坚持和发展，为我国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这个问题上，国外发展理论不可能作出这样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是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论断。

在社会诸方面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上，国外有些发展理论偏重于物质、经济的方面，有些偏重于文化、价值观念的方面，有些偏重于政治、社会的方面，也有的从多方面论述了发展问题。由于邓小平坚持用唯物史观观察与分析社会发展问题，因而坚定不移地确立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紧紧抓住这个中心不放。与此同时，邓小平还以辩证法为指导，坚持了重点与全面、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断，强调了科技、教育发展的优先地位，重视民主法制建设、文化建设与人的素质的提

高。邓小平提出了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的两手抓的方针,促进了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2. 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

在发展动因与触及到的社会层面、内部与外部因素关系等问题上,社会发展的内因论强调了内部文化价值观念的作用而忽视了其他因素,并回避发达国家给不发达国家造成的不利影响。依附理论与之相反,突出了外部因素的干扰而忽视了内部因素在自身发展中的作用。内源发展理论重视发展的内源性,但对自身的传统、价值观念与社会结构缺乏具体的分析,并且忽视了外部因素的作用。上述理论虽有不同程度的合理性,但却表现了明显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没有全面、深入地解决不发达国家发展的动因以及内部与外部因素的相互关系问题。我国不仅是发展中国家,而且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现代化具有“后发型”与“社会主义”这样两个鲜明的历史特点,我们所面临的发展问题,不是照搬上述理论所能解决的,何况上述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也没有很好的解决!这里所说的“后发型”,是相对起步于17、18世纪的一些“先发型”的现代化国家来说的;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则相对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而言的,并且,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自身的发展中走了弯路,背上了一定的历史包袱,如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体制,等等。因此,我们所面临的,不仅有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更有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则在更深的层面上解决了当代中国的发展动力以及内外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与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倡导并逐步推进了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到科技、教育、文化、政治体制,从单项到综合,从微观到宏观的全面改革,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持久的动力。邓小平关于改革也是一场革命,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的论述,是对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重要贡献。就其所涉及的内涵与外延、深度与广度来说,都大大超出了国外发展理论所论及的内容。

对外开放,是符合于经济社会与一切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政策,也是在发展中正确处理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相互关系的有力举措。我们不能由于害怕外部因素的干扰而把自己封闭起来,也不能孤芳自赏而不去利用外部的有利条件,我们必须立足于国内,并在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求得自身的尽快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开放与大规模国际交往的时代,但后来逐渐变得封闭了。鸦片战争被迫打开了闭锁的大门,但随之而来的是国家主权与民族独立的逐步丧失。新中国建立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又由于国际国内种种因素的干扰,使我国经济基本处于封闭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作出了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邓小平多次到深圳等特区视察,不断地推动了对外开放的迅速发展。在对外开放中,我国已经和正在通过大规模地引进国外资金、先进技术、设备与管理经验来发展自己,以逐步改变作为“后发型”国家的不利条件与劣势,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与优势,使自己尽快发展起来。

3. 制定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战略,在发展速度、发展形式与发展规律上,提出一系列有价值的新见解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为我国制定了21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以及三步走的战略步骤。这完全不同于50年代盲目提出的赶超英美的口号,而是立足于当代实际得出的完整战略。事实证明,这一发展战略既是宏伟的,又是切实可行的。

建国头30年,我国曾在发展速度上几经波折,多次总结,形成了百分之四、五、六的速度是

比较合适速度的认识。应该说，这样一种认识，是符合于当时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占绝对优势、经济上基本处于封闭条件下可能有的发展速度的一种正确认识。然而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上述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外资金、先进技术、设备的大量引进，全面改革所提供的巨大推动力，都为我们提供了加速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一些国家也为我们提供了先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要积极争取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这个速度不是百分之四、五，更不是百分之二、三，而是百分之九左右。这个速度，比我国过去长期形成的观念，接近高出一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实践证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个速度既是比较积极的，也是比较稳妥的，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是已经为实践证实的客观真理。确立这样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解决国内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逐步改变“后发型”国家的不利地位，逐步接近和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至关重要的。

邓小平提出，我国的经济发展，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这实质上提出的是一个由量及质的跳跃式发展问题。这种状况表明，如果我们能保持年增长率百分之九左右的发展速度，不出三五年，就会形成一个大变化。邓小平对上海提出的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也包含着类似的思想。这种大变化，大变样，就是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构成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部分质变，例如 80 年代中期的大发展，1992 年以来的加速发展。

邓小平还指出，可能我们的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回顾历史，毛泽东同志也曾论述经济建设的波浪式前进问题，但实际的结果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曾两度在盲目冒进与比例失调两极之间跳跃。邓小平所说的波浪式前进的内涵与此不同，它承认可能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阶段，也指出发现问题要及时调整，但这既区别于大起大落，又区别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概括。

4. 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发展道路问题上，西方中心主义者普遍认为，一切国家的现代化都要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先发型”的国家自不待言，“后发型”的国家也不例外。现代化趋同假设同样认为，发达国家走过的路，也就是不发达国家将要走的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虽然也为不发达国家设想多种道路，但绝大多数都没有离开资本主义现代化范畴。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尽管有许多人对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问题进行过探索，但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然而，邓小平却以他的勇气和智慧，为中国开创了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是照西方的路子走，搞资本主义现代化；也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书本当教条，而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的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中国的发展，具有由中国基本国情所决定的种种特点。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的结合，就从根本上保证了这种特色存在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同时也保证了这一事业的顺利发展。当然，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并不是世界现代化整体进程之外的另一种发展道路，而是世界现代化整体进程中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一条发展道路。

5. 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为我国的建设与发展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分析东西问题、南北问题以及世界总趋势的基础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这一论断，把发展放到了当代世界的突出地位，同时也相

关的指出了和平对于发展的重要意义。发展问题,既涉及发达国家,更涉及大量发展中国家。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既是过去造成许多国家不发达的重要因素,又是今天制约发展中国家并进一步拉大南北差距的重要手段。在国际社会中,不平等的交换广泛存在,沉重的国际债务压得一些发展中国家喘不过气来,少数发达国家设置贸易壁垒,搞封锁禁运,利用人权干涉别国内政。过去,全球发展理论就曾提出重建国际秩序的主张,今天,这一主张更是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认同,我们应该为此而努力。适应于我国国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展了全球外交与周边外交,实现了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就我们的愿望而言,是希望进一步扩大同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多方面交流与合作的,但一些不尽人意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我们只能在复杂的环境中为自身的尽快发展而奋斗。

6. 提出必须大胆吸收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自己

实现我国现代化,不能全盘西化,但也决不能拒斥西方的优秀文明成果。长期以来,在许多人的头脑中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观念,以为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都是应该为社会主义所排斥的,因此就出现了遇事要先问一个姓资姓社的问题,并为此而引起争论,造成了思想混乱。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拨开了人们思想中的迷雾,继实践标准大讨论、生产力标准争论之后,又一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迎来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速发展的新局面,敢试、敢闯、敢冒的精神大为发扬,经济开发区、技术开发区进一步发展,吸引外资与先进技术的规模进一步扩大,金融、外贸、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进一步深化,企业股份制改造进一步加快。可以说,邓小平关于必须大胆吸收西方优秀文明成果来发展自己的论述,不仅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而且进一步健全了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这对于实现我国的现代化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

在概括地论述邓小平新发展观的基本内容之后,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它的突出特点,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地位与现实意义。

首先,我们可以说,它是反映我国现代化历史特点的发展理论。如前所述,我国现代化自19世纪中期起步,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艰难历程,具有“后发型”与“社会主义”两个极为重要的历史特点,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有一个从物质文化到科学技术、制度文化、理论方法、价值观念的认识过程,在认识逐步深化的基础上作出“回应”也有一个过程。但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这种“回应”是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进行的,不可能稳定解决中国的现代化与发展问题。新中国建立以后,本来有条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进,但在前进中又经历了曲折。毛泽东同志虽然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等著作中,对中国发展道路进行过某些有益的探索,但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却初步建立了这样一种反映中国现代化历史特点的发展理论,回答了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以关于发展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实行对外开放,开展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利用国外资金、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回答了“后发型”或发展中国家如何谋求自身的发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进而,又以推动全面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坚持一系列两手抓的方针,抓住机遇、加速

发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走自己的特殊发展道路等理论观点,回答了有关社会主义发展与现代化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果说在第一个层面上以往还有过一些有价值的探讨的话,在第二个层面上以往却没有多少可资借鉴的东西,把两个层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作出相对完整的论述并在实践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不能不说是一种创造。

其次,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发展理论与发展哲学。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谋求解放的学说,是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学说。邓小平的新发展观,无论就其基本思路、主要内容与最终目的来看,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然而,这不是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在运用中,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总结人民群众新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国内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是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发展理论。它既不同于国外已经形成的种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历史中种种僵化的理论与观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是人类认识的伟大工具。邓小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察当代世界与中国,充分发挥了这一哲学的认识性和工具性功能,解决了当代中国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论述,关于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的论述,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相互关系的论述,关于一系列两手抓方针的论述,关于发展速度、发展形式与规律的论述,关于走自己的特殊发展道路的论述,关于大胆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论述,等等,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地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成果。哲学是这一发展理论的指导观念、支柱与灵魂。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邓小平的新发展观也是一种“发展哲学”。它不是远离现实生活的玄思,也不同于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等以社会的某一或某些领域的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分支性学科,而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对各个领域的发展进行深层思考,并展开其现实性与丰富性的应用性、工具性、务实性哲学。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与“发展哲学”,是实践的需要,也是使哲学从天国回到尘世的一条重要途径,应该成为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正如党的十四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与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既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内容,又涉及文化、科技、外交等众多的方面。邓小平的新发展观,是这一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其作为揭示当代中国发展规律的发展理论而言,它涉及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教、外交等诸多方面,当然也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有直接关系。就其作为一种“发展哲学”,既属于哲学的一部分,又属于对众多方面发展的一种哲学思考。因此,学习和掌握邓小平的新发展观,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需要我们花功夫、下气力才能获得。

邓小平的新发展观既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理论升华,又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深入理解和掌握它的精神实质与丰富内涵,不断摆脱原有观念的束缚与制约,将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高速、持续、健康的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